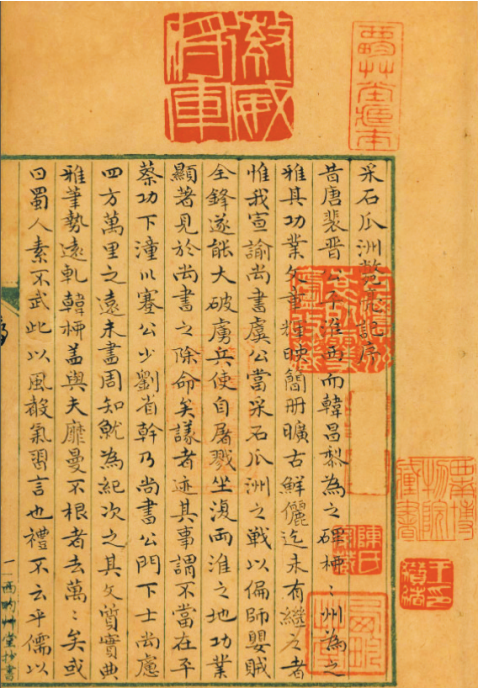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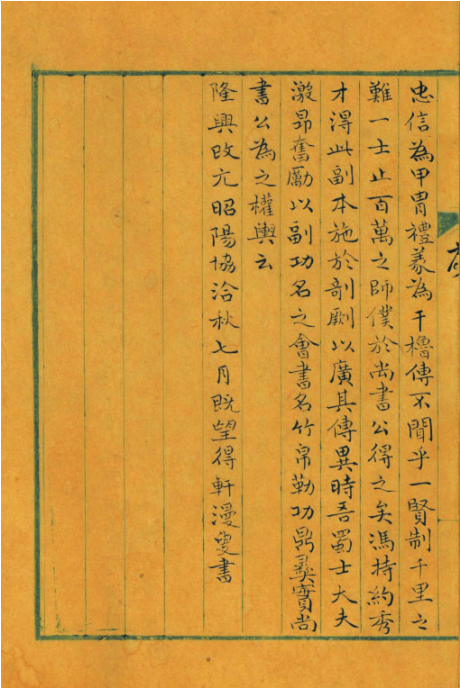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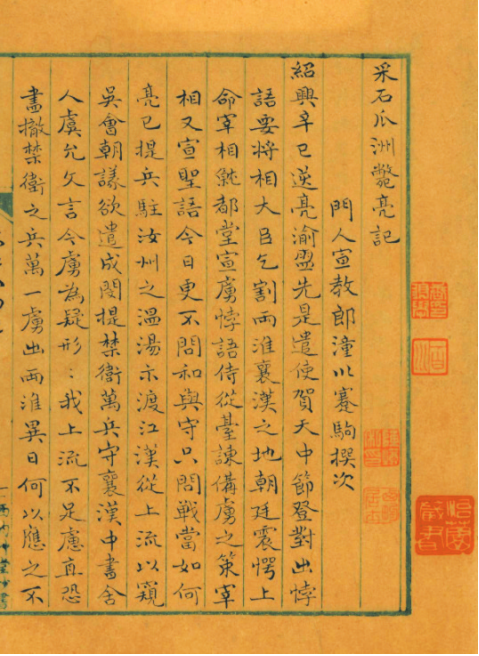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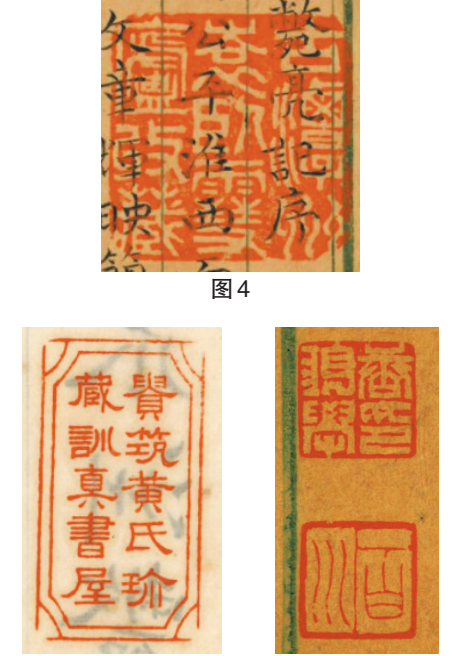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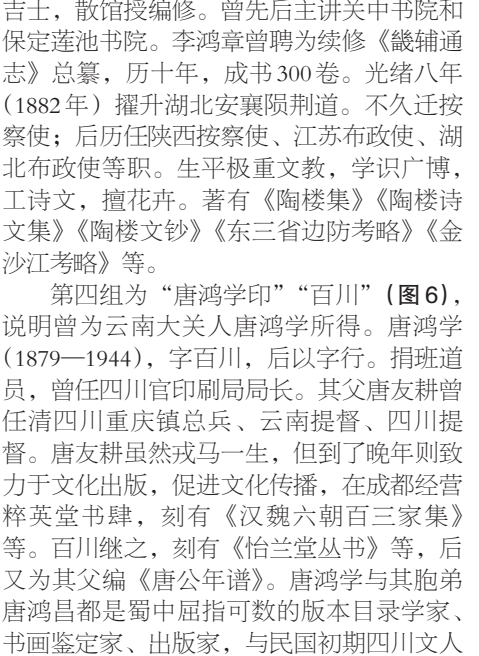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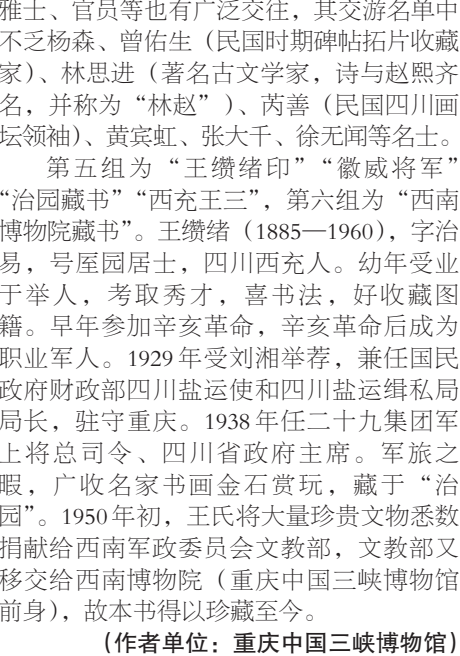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《采石瓜洲毙亮记》流传小考

杨靖	
	图1
	图2
	图3
	图4
	图5
	图6

(上接6版)

“破旧立新”思想的物质化表达

《西厢记》最早源于唐元稹的传奇《会真记》(又名《莺莺传》)。经过宋金时期的流传和演绎，增添了佛教奇逢、月下联吟、闹道场、张生害相思莺莺问病、长亭送别、村店惊梦等情节。元人王实甫在此基础上，又将作品加工定型成杂剧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。

《西厢记》故事说的是唐元元年间，前朝崔相国病逝，夫人郑氏带女儿莺莺、小儿欢郎、侍女红娘一行30余人回河北博陵安葬，中途道路有限，在河中府普救寺暂住。此时，河南洛阳书生张珙赴长安赶考，路过河中府看望同窗好友白马将军，顺便游览普救寺时与莺莺相遇，产生爱慕之情。张生为追求莺莺，借住寺中，其住所与莺莺所住西厢只一墙之隔。一天晚上，莺莺同红娘在花园烧香祷告，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：“月色溶溶夜，花荫寂寂春。如何临皓魄，不见月中人？”莺莺立即和诗一首：“兰闺久寂寞，无计度芳春。料得怀吟者，应怜长叹人。”两人月下联诗对句，互生情愫。民国铜胎画珐琅《西厢记》盘之一的一面内容，便是这出“月下联吟”。“月下联吟”又名“墙角联吟”，一轮明月当空高悬，一道粉墙内外，张生与崔莺莺翩然而立，崔莺莺满脸娇羞，张生执扇跃跃欲试，充分表现出人物对对方的向往之情。

另一盘画面内容表现的则是“锦字传书”。叛将孙飞虎领兵围住普救寺，要抢莺莺为妻，崔夫人四处求救无援，许愿说“谁有退兵计策，就把莺莺嫁给谁。”张生挺身而出，写信给白马将军杜确，打退孙飞虎。不料崔夫人事后言而无信，不肯把莺莺嫁与张生，张生因此生病。莺莺让红娘前去探望，张生托红娘传书，表达想与莺莺月下相会之意。

自元代以来，《西厢记》便是“才子佳人”文学的典范，但在民国的传播又被赋予新内涵。五四运动后，知识界将崔莺莺与张生的自由恋爱视为反抗“父母之命”的象征。1926年，梅兰芳大师改编的京剧《西厢记》在上海天蟾舞台连演三十场。在此期间，上海著名珐琅生产商永宝斋接到的“西厢”题材订单激增五倍。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在《白话文学史》中重新评价《西厢记》，将其列为“活文学”典范。这种文化风向的转变，使得“西厢”故事成为新旧文化阵营都能接受的审美公约数。这两件铜胎画珐琅《西厢记》盘通过人物姿态的生动刻画，如崔莺莺低眉垂首的羞涩、张生如痴如醉的苦思冥想等等，暗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。此类作品在市民家庭中的陈设，成为新文化运动“破旧立新”思想的物质化表达。

民国珐琅工艺的文化调适

民国铜胎画珐琅盘的尺寸多介于20~

30厘米，兼具果盘、摆件等实用功能，定价低于清代御制品，主要面向城市新兴中产阶级。其装饰风格调和了文人的“雅”与商贾的“俗”：题材上强调风雅，形式上却又迎合世俗审美。这种双重性揭示了民国中产阶级在文化身份上的矛盾——既渴望攀附传统士大夫品位，又难脱市民功利主义的影响。笔者注意到，同期题材有些珐琅盘上，甚至直接出现“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字样，人物服饰大红大绿流于俗艳。与之相较，河北博物院收藏的两件铜胎画珐琅《西厢记》盘，别具一番典雅蕴藉之美。

20世纪30年代，面对洋货倾销，国民政府发起“国货年”运动，将传统工艺塑造为民族精神象征。铜胎珐琅作为“国粹”被纳入博览会(如1929年西湖博览会)展陈，舆论称其“釉彩斑斓，足证中华文明之璀璨”。西厢记题材因本土文学属性，进一步强化了“反殖民”文化认同，成为抵制日本七宝烧、欧洲搪瓷器的符号武器。有意思的是，面向本土市场的“西厢”珐琅产品，更强调吉祥寓意(如以“西厢”谐音“喜祥”)。另一部分通过上海、广州等口岸销往欧美的“西厢”珐琅盘，其设计则主动迎合西方“中国风”审美，如增加繁复的卷草纹边框、以金线勾勒轮廓，或添加英文商标“Made in China”等等。这种内外有别的生产策略，映射出民国工艺在全球化贸易中的文化调适。

(作者单位：河北博物院)

“铁柱高风”绢本图轴

——穿越百年的赣鄱风华图卷

钟力文

在八大山人纪念馆的藏品中，“铁柱高风”绢本图轴宛如一把珍贵的钥匙，轻轻开启了一扇通往百年前江西历史与文化深处的大门。这幅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的结晶，更是承载着赣鄱大地丰富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的重要载体，其价值远远超越了绘画本身，成为研究江西历史、文化与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。

图轴基本信息：精笔细绘现真容

“铁柱高风”绢本图轴诞生于风云变幻的清代宣统元年(1909年)至三年(1911年)。彼时的中国，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愈发激烈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袁戴春与张彦谦两位创作者，以绢为纸，以笔为媒，精心绘制出这幅长卷。作品采用绢本材质，绢的细腻质感为画面增添了一份古朴与典雅。其规格为纵180厘米，横84厘米，这样的尺寸在传统书画作品中，既保证了画面的宏大叙事空间，又便于细致入微地刻画细节。

从绘画技法来看，此图轴运用了传统界画形式。界画是中国绘画中极具特色的一个门类，它以严谨的线条和精确的比例描绘建筑和景物，需要画家具备深厚的绘画功底和对建筑结构的深刻理解。在“铁柱高风”中，画家通过细腻而规整的线条，将万寿宫的亭台楼阁、飞檐斗拱一一勾勒出来，建筑的每一处结构、每一个装饰都清晰可见，观者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些冰冷的砖瓦、精美的木雕。画面以俯视角度呈现，这种独特的视角在传统绘画中并不常见，它打破了常规的平视或仰视构图，让观者仿佛化身飞鸟，盘旋于万寿宫上空，得以将整个建筑群的全貌尽收眼底。无论是主体建筑的巍峨气势，还是周边环境的布局规划，都在这一视角下展露无遗，为后人真实地还原了当时万寿宫的境况。

虽然从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来看，“铁柱高风”或许无法与那些艺术大师的巅峰之作相媲美，作者之一袁戴春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难寻踪迹，相关资料寥寥无几。然而，正是这样一幅看似普通的作品，却因为其所承载的特殊意义，在江西文化的脉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成为江西人心中一份独特的情感寄托。

万寿宫的历史脉络：千年兴衰话沧桑

图中四百余字的题跋，宛如一部浓缩的历史典籍，为我们详细记载了铁柱万寿宫的悠久历史。万寿宫原为晋代奉祀许逊而建的许仙祠，宋代奉敕改名为万寿宫。在随后的元、明、清等朝代，尽管历经岁月的洗礼、战火的摧残以及朝代的更迭，铁柱万寿宫却始终备受尊崇，成为南昌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。

万寿宫坐落于南昌旧城广润门内的翠花街，这一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。此地处于水陆交通枢纽，赣江的滔滔江水带来了便利的水运条件，使得这里成为货物集散、商贾往来的重要场所，物流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。与此同时，许真君信仰在江西地区深入人心，许真君以其治水济民的功绩，被当地百姓奉为神明，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。水陆交通的优势与许真君信仰的结合，让万寿宫逐渐演变成旅人驻足、商会汇聚的场所，集宗教、商业与人文功能于一体。在这里，袅袅香火中弥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，热闹的集市里回荡着商贩的吆喝声，不同地域的文化也在此相互碰撞、交融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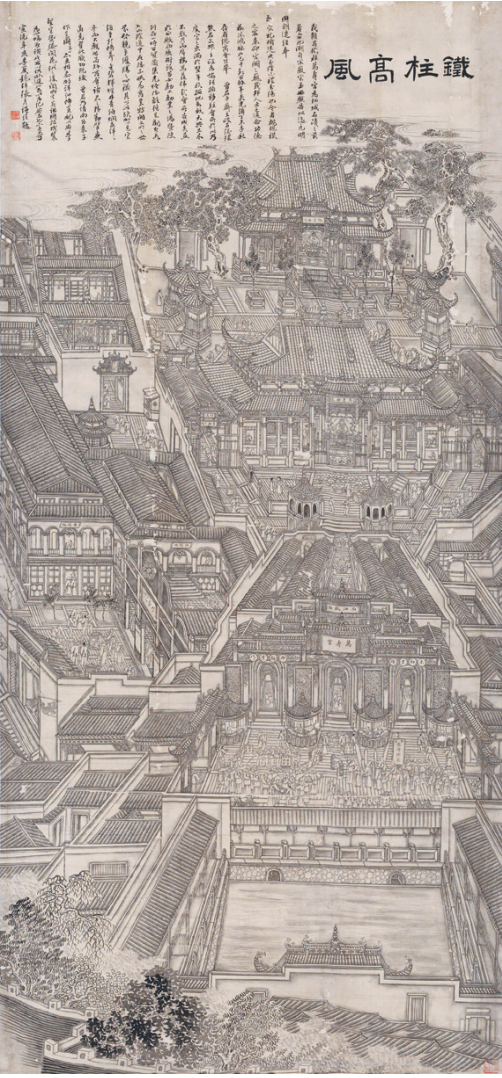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流转至1907年，江西省总商会的入驻，为万寿宫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时，总商会推举曾霁为总理，熊文叔为协理，将商会会所迁至万寿宫。此后，商会在宫之东隅拓地数亩，大兴土木，一座层层高矗的会所拔地而起。不仅如此，商会还在正殿两庑附设男女劝工劝业之场和陈列所。劝工劝业之场的设立，旨在鼓励人们发展工商业，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；陈列所则展示各地的特色商品和手工艺品，促进了商业信息的交流与传播。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商业的发展，使得万寿宫从单纯的宗教场所，逐渐转变为商业与文化的双重中心，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

为庆祝新万寿宫落成这一盛事，曾平斋邀请袁戴春创作此图，张彦谦参与布局设计。两位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，不仅如实描绘了万寿宫的建筑风貌，还巧妙地融入了府学、滕王阁、百花洲等南昌著名景致。这些元素的加入，使得作品不仅仅是一幅建筑画，更成为一幅展现南昌城市风貌与文化底蕴的全景图。经过长达两载的精心创作，这幅四幅连缀的作品终于完成，它不仅是一件艺术佳作，更成为一份承载着特殊纪念意义的珍贵资料，可供后人“卧游”欣赏，在画卷中领略南昌城的名胜风华与历史韵味。

图轴画面解读：市井百态入画来

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“铁柱高风”的画面，仿佛穿越时空，置身于1911年的万寿宫。画面中，房屋林立，这些建筑风格各异，功能也不尽相同。既有庄重肃穆的庙宇殿堂，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彰显着宗教建筑的威严与神圣；也有错落有致的民居商铺，青瓦白墙，门窗雕花，展现出普通百姓的生活气息。不同风格的建筑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建筑画卷，反映出当时南昌的建筑特色和社会风貌。

穿梭于房屋之间的各式人物，更是为画面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。画家对人物的刻画细腻入微，无论是衣着服饰的纹理，还是面部表情



“铁柱高风”绢本图轴

的神态，都栩栩如生。画面中，有人行色匆匆，或许是为生活奔波忙碌的商贩；有人驻足交谈，可能是在商议生意的商人；还有人在万寿宫前虔诚祈福上香，将对未来的期许寄托于许真君的保佑。这些人物的姿态、动作各不相同，却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图景，让我们得以窥见百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。宗教信仰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通过这些场景得以凸显，许真君信仰不仅是一种精神寄托，更成为维系社会秩序、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万寿宫在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。它不仅是宗教圣地，更是江西商帮的重要据点。江右商帮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之一，在商业贸易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力。遍布沿江流域、海上丝路与茶马古道的上千多座万寿宫遗址，成为江右商帮在外地的重要联络点和精神家园。在动荡不安的年代，远离家乡的江西商人在这里互帮互助、抱团发展，万寿宫“商道一体”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它不仅为商人提供了商业交流、货物中转的场所，更成为他们情感交流、心灵慰藉的港湾，见证了江西人团结协作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这种精神也成为江右商帮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。

万寿宫的时代变迁：岁月流转韵犹存

在封建社会时期，万寿宫供奉的许逊，其忠孝伦理思想成为江西人的重要信仰和精神寄托。许逊治水济民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他所代表的高尚品德和为民情怀，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江西人。同时，统治者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信仰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，将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、稳固统治的工具。万寿宫因此成为封建社会时期政治、宗教和文化的重要象征。

然而，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族入侵和社会动荡，在时代的浪潮冲击下，万寿宫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宗教和政治功能。曾经香火鼎盛、人声鼎沸的庙宇，渐渐变得破败荒芜，最终倒塌，只留下残垣断壁，成了一个地名和等待保护的文化遗产。但万寿宫承载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价值，却并未随着建筑的衰败而消逝，它依然在人们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成为人们追忆往昔、传承文化的精神符号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百姓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希望和依靠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政府对万寿宫进行了原址重建，并将其打造为“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”。经过精心规划和建设，这里成了备受游客喜爱的打卡胜地。如今的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，虽然少了往昔的香火缭绕，但商业氛围却愈发浓厚，商贾云集，店铺林立。传统的老字号与现代的商业元素相互融合，既保留了历史的韵味，又展现出时代的活力。这里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场所，更是文化展示与交流的平台，人们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江西美食，欣赏到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，感受到赣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其商业价值和文化魅力依然不减当年。

作为江西千年变迁的见证者，万寿宫无疑是赣文化的重要印记。“铁柱高风”绢本图轴以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江西过去的窗口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应更加重视和保护这一文化遗产，通过数字化技术、学术研究、文化展览等多种手段，深入挖掘其内涵，让它在当代继续散发独特魅力，向世人讲述赣鄱大地的千年故事，成为连接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桥梁。

(作者单位：八大山人纪念馆)